

人民日報

RENMIN RIBAO

1980年7月

21

星期一

庚申年六月初十

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晴转阴傍晚有

小雷阵雨 偏南

风力 二、三级

夜间 阴转晴

偏南 偏北

风力 二、三级

温度 最高 33°

最低 22°

各级党委人民政府重视 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配合

上半年全国职工住宅竣工面积1110万平方米

除青海海外各省市都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加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工矿住宅竣工面积1,110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76%；上半年住宅建设开工面积7,371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54%。

全国除青海省住宅竣工面积保持去年的水平外，其它省、市、自治区住宅竣工面积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增长1倍至2.2倍的有山西、上海、甘肃、云

南、广东、福建、湖北、内蒙古、贵州。

上半年住宅竣工面积比较多，主要由于各级党委、人民政府的重视，计划下达得较早，有关部门在资金、材料方面大力支持和配合，施工力量也作了妥善安排，保证了许多住宅按时竣工。同时，去年结转工程较多，也为今年上半年竣工创造了条件。

新华社南宁七月二十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最近正式推广使用空心混凝土大板构件建造住宅。

在此以前广西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使用这种新型构件的生产技术已进行了五年的研究，并在建筑行业实际应用中，基本上解决了大板构件的施工技术难题，以及用大板构件建造房屋的安全程度、墙体隔音性能等方面的课题。自治区有关部门先后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区新建和改造了九个工厂、共形成七条生产线，使空心大板构件的年生产能力达到八万七千多平方米，可供建造三十多万平方米的住宅。

广西用空心混凝土大板构件盖房

材料单一，结构简单，施工周期可以缩短三分之一，率可以提高一倍，施工周期可以缩短三分之一。

目前，全自治区已建成的住宅，有五十多万平方米，新建住宅的内墙、柱、梁、板、楼梯等，都是用普通混凝土大板构件建造的，结构比较简单，施工周期可以缩短三分之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最近正式推广使用空心混凝土大板构件建造住宅。

在此以前广西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使用这种新型构件的生产技术已进行了五年的研究，并在建筑行业实际应用中，基本上解决了大板构件的施工技术难题，以及用大板构件建造房屋的安全程度、墙体隔音性能等方面的课题。自治区有关部门先后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区新建和改造了九个工厂、共形成七条生产线，使空心大板构件的年生产能力达到八万七千多平方米，可供建造三十多万平方米的住宅。

在此以前广西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使用这种新型构件的生产技术已进行了五年的研究，并在建筑行业实际应用中，基本上解决了大板构件的施工技术难题，以及用大板构件建造房屋的安全程度、墙体隔音性能等方面的课题。自治区有关部门先后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区新建和改造了九个工厂、共形成七条生产线，使空心大板构件的年生产能力达到八万七千多平方米，可供建造三十多万平方米的住宅。

在此以前广西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使用这种新型构件的生产技术已进行了五年的研究，并在建筑行业实际应用中，基本上解决了大板构件的施工技术难题，以及用大板构件建造房屋的安全程度、墙体隔音性能等方面的课题。自治区有关部门先后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区新建和改造了九个工厂、共形成七条生产线，使空心大板构件的年生产能力达到八万七千多平方米，可供建造三十多万平方米的住宅。

在此以前广西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使用这种新型构件的生产技术已进行了五年的研究，并在建筑行业实际应用中，基本上解决了大板构件的施工技术难题，以及用大板构件建造房屋的安全程度、墙体隔音性能等方面的课题。自治区有关部门先后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区新建和改造了九个工厂、共形成七条生产线，使空心大板构件的年生产能力达到八万七千多平方米，可供建造三十多万平方米的住宅。

促进经济联合是一项重要政策

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经济联合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我国各地开始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为了推动经济联合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国务院领导同志最近接见新华社记者，回答了记者所提的一些问题。

问：为什么要实行经济联合，联合有什么好处？

答：经济联合，可以扬长补短，发挥各个经济单位的优势，提高经济效果，加快生产建设步伐；有助于把地方、企业的物力、财力吸引到国家建设急需的方面来；有助于按照经济规律沟通横向联系，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分割；有助于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工业，避免以小挤大，盲目生产，盲目生产。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是调整好国民经济和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问：经济联合应该怎样组织？遵循哪些原则？

答：组织联合，一定要从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出发，坚持自愿原则，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行组织。一般应当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以自下而上为主，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逐步发展，不要一哄而起。

组织联合，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但不能随意改变联合各方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关系。参加联合的各方原有的收入解缴关系，以及同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得改变，如果需要改变时，应当征得财政部门 and 银行的同意。

组织联合，要平等互利，兼顾各方的经济利益。根据各方提供的条件，包括资金、原料、技术、劳力、场地、设备、设施等，确定分享经营成果（利润、产品）的比例，签署协议或合同。联合的形式，要从实际出发，允许多种多样，不要硬套某种模式。

问：怎样推进原料产地与加工地区的联合？

答：要推进原料产地与加工地区的联合。原材料必须首先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调拨任务。超过部分，经过协商，有的可以由加工地区返还一部分利润或产品；有的可以由加工地区与原料产区联合经营，就地加工。

问：对联合企业的原料供应、产品销售有些什么规定？

答：联合企业内部原料的供应，不再经过商业、供销、物资等中间环节，实行直接供应。国家分配的原料，目前仍按联合双方的隶属关系，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有的直接供应；有的由商业、供销、物资企业就近就近组织供应。

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的前提下，超计划的产品和自己组织原材料生产的产品，有的可以由商业、物资部门收购，有的可以按国家政策自销，互通有无。

问：在税收和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上，对经济联合体有什么要求？

答：各种经济联合体都必须保证国家税收和利润上交任务的完成，履行对国家的义务，不得挤占国家的财政收入。参加经济联合的各方，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办法，应当各按原来的规定执行，不要轻易变动。

（下转第三版）

充分发挥本地长处 促进两地经济繁荣

北京西藏发展相互间经济协作

新华社拉萨7月18日电 西藏今后要逐步增加向北京市提供畜牧产品和中药材，北京市也将向西藏提供民族特需商品、日用工业品和轻工、手工业机具设备。

北京市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市提供羊毛、牛绒、牛皮等畜产品。北京市以此为原料，生产毛线、皮靴、皮靴等产品，然后以购销形式供应西藏。在今年内，西藏还将向北京市调拨一部分麝香、虫草、贝母等中药材；北京也要向西藏自治区提供一部分红绿呢料、冲花茶氈、八磅暖水瓶等民族特需商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一部分生产地毯所用的平活机、滚刀、电剪等机具设备。此外，北京市在今后五年内还要为西藏自治地区、制革和雕刻等手工业的技术工人。

北京西藏自治方面就开展经济协作签订的协议书规定，为了支援首都经济建设，西藏自治区1980年在国家调拨计划外，再以购销形式向北京

社论

热烈欢迎孟加拉国贵宾



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齐亚·拉赫曼阁下和夫人，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国事访问，定于今天到达北京。我们对来自友好邻邦的孟加拉国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孟加拉国是一个富有朝气的年轻国家。以齐亚·拉赫曼总统阁下为首的孟加拉国政府，为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国际事务中，孟加拉国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强调在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注意加强同邻国和广大穆斯林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同时，积极发展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在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孟加拉国政府同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和谴责，强烈要求一切外国军队从阿富汗和柬埔寨全部撤出，让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孟加拉国政府这种坚持原则、伸张正义的立场，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赢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尊敬。

当前，由于霸权主义者疯狂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使亚洲和整个世界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最近，苏联在所谓“部分撤军”的烟幕下加紧调兵遣将，进一步强化侵略阿含；越南当局在玩弄“对话”骗局的同时，悍然出兵入侵泰国。这就表明，霸权主义和扩张野心是无止境的。这就需要一切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中孟两国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近年来，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友好合作日益扩大。现在，齐亚·拉赫曼总统阁下和夫人前来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孟两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

“云南地质通”范承钧

后，一直在云南从事地质技术工作。早在1958年，他就是当时新成立的云南区域地质调查队的工程师，负责全队的技术工作。

范承钧作为技术上的总负责人，从不满足于在室内看图片、作规划、组织编写报告，而是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跑野外，查看、分析一个个矿点，在现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有一次，范承钧身背10多公斤重的行装，同一批地质人员一起，从大理的苍山出发，穿过无量山，沿着横断山脉的陡峻峰岭，直插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一个多月时间里徒步跋涉一千多公里，为确定这一带的地质年代搜集了可靠的资料。

去年，范承钧接受了编制全省矿产远景区划规划的任务。在综合整理过资料的基础上，他连续五次到野外调查验证，每次都在一个月以上。全省最高的山脉，

最深的峡谷，最热的坝子，最冷的雪山，无处不留不下他的足迹。

通过长期大面积艰苦细致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范承钧带领地质工作者总结出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成果规律，为解决云南地质工作中某些基本问题和矿产产地问题提供了依据。他检查看过的二、三十处矿产地，地质工作者已从中发现大型矿床18个，中型矿床4个。现已探明的有滇中铜矿、兰坪巨型铅锌矿、元谋铅矿，以及一批已经普查、尚须勘探的锡矿、铁矿、铜矿等。范承钧长期主持技术工作的云南省区域地质调查队，取得的成绩也很突出。20多年中，共普查出远景区近200处，提交矿产普查报告200多份。谈起云南矿产资源状况，范承钧一行同人们一致公认他是个“云南地质通”。

本报记者 张炳森 本报通讯员 王正端



安徽省劳动模范、泾县东公供销社政治指导员翟国恩(左)，送货到达的高岭坑生产队，为群众服务。

新华社记者 傅振旗摄

不怕讲败笔

电视有个节目，是介绍邮票设计家孙传哲的。孙传哲从事邮票设计已三十多年。解放以后，我国发行的四百套邮票，约有四分之一是他设计的。最近评选出来的建国三十年最佳邮票三十套，就有十一套是由他单独设计或与别人共同设计的。孙传哲在同观众见面时，介绍了他的若干得意之作，如开国大典纪念邮票、梅兰芳舞台艺术纪念邮票等的创作过程和特点。有得看来，这位邮票设计家思路开阔，兴趣广泛，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听后很有启发。

更受启发的是，孙传哲向观众介绍自己的成功之作的同时，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败笔，并且当众拿出几幅来解剖。你看，这一幅是由时间仓促、单纯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而失败的，这一幅的图画犯了贪多求全的毛病，这一幅加了个多余的花边……谈到这些的时候，孙传哲好象不是在讲自己的作品，而是象一个严格的评论家在剖析别人的作品。

一个艺术家在取得许多成功以后，不忘记自己的败笔，不讳言自己的败笔，这种精神很可贵。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攀上更高的艺术之峰。

人们饮食的口味是这样，人们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也有个口味的。在有什么电影，读什么书，唱什么歌一类问题上，当然，应该引导，提醒人们不要“饥不择食”，不要“偏食”，等等。但是，也不能不顾及人们的口味，去搞“整齐划一”之类，那样是会伤害人们的“胃口”的。弄得不好，会事与愿违，得到相反的效果。

任美康

钟怀

钟怀

钟怀

钟怀

钟怀

新华社哈尔滨7月20日电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牡丹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上午分别在北安县北安镇和牡丹江市公开审判两起苏联间谍案；依法判处苏联间谍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有期徒刑七年，判处苏联间谍王嘉胜死刑。

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庭庭长张文惠担任审判长。

开庭时，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黑河分院检察长邱永发提起公诉。

起诉书说，被告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男，36岁，苏联国籍，俄罗斯族，1974年6月20日潜入黑龙江省，在爱辉县小五家子下游登岸后即被边防军民捕捉，当场缴获他随身携带的苏制“杰尼特—E”型照相机一架，苏制手枪

黑龙江省公开审判三起苏联间谍案

判处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有期徒刑七年；判处王嘉胜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朱有淮死刑，缓期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支，子弹16发，以及匕首、脚蹼、三色信号灯、指北针等间谍用具。

法庭出示了罪证。

被告供认，他家住苏联马加丹州中康斯克区格鲁克林村，公开职业是“七年计划”金矿工人，1971年5月被苏联远东军区情报机关招募，经过长期特工训练，后来接受派遣潜入中国境内，企图秘密拍摄中国边防军事设施，窃取军事情报。

法庭随即进行了调查，又听取了律师孙朴的辩护。

由审判长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足以认定被告触犯了我国法律，危害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已构成间谍罪。为了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不受侵犯，审判长宣布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和第97条第3项的规定，判处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间谍罪，有期徒刑七年。

在牡丹江市的公判庭上，人民检察员吴景龙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牡丹江分院向牡丹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说，被告王嘉胜，男，36岁，中国籍，汉族，1962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王嘉胜期满后在农场就业，于1975年9月19日逃跑，叛国越境到苏联，



这是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被捕后的照片。



新苏社稿



新华社更正 十八日播发《北京第二热电站第一期主体工程全部建成投产》稿（见本报19日第一版），第二段中的“360万百万大卡”应为“360万大卡”。

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招募为间谍。经过特工训练，王嘉胜于1976年6月25日接受苏联间谍机关的派遣，潜入我国境内，刺探、搜集了我重要情报之后，偷越国境返回苏联，得到苏联间谍机关的赏识。1979年6月30日，王嘉胜再次接受苏联间谍机关的派遣，携带“华尔特”手枪、子弹、匕首、活动经费、伪造的证件、情报密件等潜入我国穆稜县境内，7月3日被我铁路职工和公安人员捕获。王嘉胜拒捕杀人，开枪打死我民警秦亚东。

在公判庭上，王嘉胜在大量的物证和证人证实面前，对公诉人提出他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

辩护律师钱化民作了辩护发言之后，审判长袁金芳宣布判决：王嘉胜故违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叛国投敌，充当苏联间谍，窃取情报，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扩张政策效劳，又拒捕行凶杀害我公安人员，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第3项和第103条的规定，判处王嘉胜间谍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悉，在此之前，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审判了另一起苏联间谍案。法院依法判处了叛国投敌苏联，又被苏联特务机关派遣两次潜入我国窃取情报的苏联间谍朱有淮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苏联间谍张·尼古拉·彼特洛维奇携带的苏制照相机、手枪、子弹、匕首、信号灯、脚蹼、食品等部分罪证。 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王嘉胜潜入我国时携带的手枪、子弹、匕首、活动经费等罪证。 新华社记者 刘向阳摄

大陆台胞参加旅日台胞思亲会代表团赴日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旅日台胞思亲会等单位的邀请，祖国大陆台胞参加旅日台胞思亲会代表团一行10人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日本。代表团由居住在大陆台胞比较集中的北京、上海、天津、福建、广东、河南六个省市的代表组成。的团长是台盟总务理事苏新，副团长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副主席姜仁寿，秘书长是台盟总务理事兼秘书长徐萌山。

中日友好人士代表团离京赴日访问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谭启龙为团长、交通部副部长汪少川为副团长的中日友好人士代表团，应日本“亚洲交流协会”邀请，今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赴日本进行访问。代表团成员中有全国人大代表爱新觉罗·溥杰。

秦亚东在捕获苏联间谍时英勇牺牲

“革命烈士”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秦亚东是牡丹江铁路公安分处下车站车站公安派出所驻八面通车站值勤民警。1979年7月3日凌晨，秦亚东正和战友常守杰值班，突然接到秀地养路工区巡道员吴宝禄急电报警，说是五点多钟在48公里线上发现一个身穿雨衣、体胖如熊的可疑人，朝八面通方向走去。秦亚东立即和常守杰搭乘轨道摩托车赶往现场。一路上，他们瞭望巡查，直到43公里3里处，才发现那个可疑的人。他们当即停下车上前盘问。伪装的苏联间谍见公安战士盘查严密，唯恐露出马脚，趁民警看他的伪造证件时，突然掏出手枪向秦亚东开枪。秦亚东中弹倒下，随即忍着剧痛，纵身跃起，奋力挥起左臂朝敌人击去，同时用右手猛推敌人下颏，死死地扼住了敌人的咽喉。常守杰乘势奔去抓获了敌人的手枪，司机张喜文和工长隋云成紧紧地抱住敌人的双腿，使敌人俯首就擒。当时，秦亚东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以身殉职。

捕获苏联间谍王嘉胜的其他有功人员也受到了奖励：民警常守杰晋升为警长；巡道员吴宝禄、亮子河养路工区工长隋云成、摩托车司机张喜文，各记大功一次，并各获奖金1百元。

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说：

对越南侵略者必须坚决回击

外交学会宴请泰国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泰国社会行动党主席、前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今晚在这里指出，泰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对不能充分予以坚决回击，任何绥靖主义的政策都制止不了战争。克立·巴莫及其随行人员是昨天抵达北京的。今晚，他是在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柯柏年为欢迎他所访举行的宴会上说这番话的。

克立·巴莫在讲话中说：最近，在我们这个地区发生了令人烦恼的事情，好战分子正在向和平

挑战。他说，越南最近所干的事情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它可以随时侵略我们。我们泰国人民曾勇敢回答了他们。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越南侵犯我国的主权，我们一定要给它坚决回击。他指出，泰国人民热爱和平，但和平必须用警惕来保卫。世界上任何绥靖主义只能对侵略者有利，侵略者一定要侵略，绥靖主义的政策制止不了战争。

柯柏年在宴会上说：中国人民高度评价泰国政府和人民反越南侵略者所取得的胜利。

浅议实行聘请制的几个问题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刘 鹏

压力，内无动力，把学校办得一塌糊涂而心安理得的状况要好得多。各校都争着要办好教师，就会促进学校领导爱护教师，办好学校。

第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无政府主义。各校聘请教师应在国家有关部门的计划指导下进行。对于边区或国家特别需要发展的地区或部门的学校，要照顾，要扶持。应由教育立法作出规定，对这样的学校只能“补墙脚”，不准“挖墙脚”。对于同一地区、部门，条件差不多的学校，如果由于人为的原因办不好，好教师留不住，应首先其它学校招聘。如果你的学校办得好，教师自然会热爱自己工作的学校，别人想“挖墙脚”也挖不动。如果一“挖”就动，那就说明你办学校有缺点，就是提醒你想法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办好学校。你实在不努力，学校办不好，那就只有被淘汰，这种淘汰是合理的，是竞争里应之有。我国的学校不会因被淘汰而关门，无非是水平低点，名声差点，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应该承认，不能搞平均主义，办好办差一个样。只有办出高水平的学校，才能带动低水平的学

一些读者来信：

对教师实行聘请制发表不同意见

本报讯 本报7月1日

在《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专栏里刊登了陈嘉正的《教师应当实行聘请制》一文以后，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有赞成实行聘请制的，也有反对实行聘请制的。反对实行聘请制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担心有些教师因无人聘请而失业，生活没有保障。重庆十一中教师田稼来信说：读了陈嘉正同志的忆文，使我陷于痛苦的回忆之中。我教了将近四十年书。在旧社会教师实行聘请制，没有私人关系就很难拿到聘

书。现在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不正之风依然存在，学校既非“世外桃源”，而那些敢于和歪风邪气作斗争的教师，不是更要遭到解聘吗？

二、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不应靠聘请制。江苏省宿迁县埭子中学吴静庵来信说：把某些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归咎于包干制和教师胸无大志是不符合实际的，而根本原因在于十年浩劫使整个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打倒“四人帮”以后，广大教师再不用忍气吞声了。但是要进一步调动教师的积极

校向先进看齐，使水平低的学校逐步提高水平。这就会在学校之间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普遍提高各学校的办学水平。

由对教师实行聘请制，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对学校的领导干部是否也应一视同仁的问题。我认为，聘请制既适用于教师，也应适用于校长等学校领导人员。理由是：一，教师的优秀自然对办好学校关系很大，领导干部的优秀对办好学校的关系更大。一个不称职的校长比一个不称职的教师对学校的影响要大得多。就目前目前情况来看，不少学校办不好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教师水平低，而在于学校领导干部水平低。实行聘请制，首先从学校领导干部开始，才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二，教师和学校领导干部，同样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聘请制面前应一律平等。学校既然对教师实行聘请制，有择优，有淘汰，对校长等领导人同样应该有择优，有淘汰。并且，如果在实行聘请制中实行聘请制，会对在教师中实行聘请制起良好的带头作用。三，实行聘请制，有利于促进教师奋发上进，对学校领导干部也会起同样的积极作用。对不能应聘的学校领导干部应予以对待不能应聘的教师一样，采取爱护的态度，或帮助他们学习提高，或作其它妥善的安排。

性，还是要靠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现有的包干制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是提高教师积极性的唯一的正确措施，决不当以依靠实行聘请制。

三、目前实行聘请制还不可能。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余金甫来信说：今天，我们不是就不能真正实行聘请制呢？不见得。特别是在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破坏，至今仍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如果搞聘请制，就会给不正之风以可乘之机。比如目前农村中的代课教师就有重点聘请的性质，出现了徇私舞弊、请客送礼、打击报复等许多问题。

半工半读应作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

天津市第二教育局

十年动乱以前，刘少奇同志数次来天津听取半工半读教育情况的汇报，并讲了很多重要意见。到1966年，天津市已形成了一个从中技到大专、从技术教育到师范教育的半工半读教育体系。

最近，我们重新总结了过去试办各种类型半工半读学校的经验，深感发展半工半读是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的重要内容。

半工半读中专学校的专业设置都是结合生产的需要，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多是本校技术人员自编教材，自行讲授，能把生产和新产品试制中的新资料、新数据，及时反映到教学中来。学生一面在课堂上学习与生产结合的理论知识，一面到专业对口的车间参加劳动，车间工程师讲授专业课，把教学和生学较好地结合起来，学生学习的质质量较高。

一些新建、扩建工业或技术比较复杂的新兴行业，举办半工半读中专学校，领导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可使教育、生产双丰收。电光源厂办学前只能生产电铃、舌簧喇叭等产品。1958年办学，招收了700多名初中毕业生，到1960年已能生产几十种电子仪器，这时生产人员中的76%是半工半读学生。感光胶片厂前身是手工业作坊，只能生产日用玻璃干板，后来招了400名初中毕业生实行半工半读，1961年开始有第一届毕业生，这时学生占生产人员的半数，生产上首创X光胶片、黑白电影胶片、彩色电影胶片和科研用的各种干板。到1966年上半年，已培养出了500名毕业生。该厂X光胶片、120胶卷、21”软片三项民用同类产品，1979

年度被评为全国第一。这三种产品试制组中，半工半读毕业生均占60%。X光胶片组的技术负责人就是半工半读毕业生。

半工半读中技校招收初中毕业生，来校学习三至四年。在这期间一面学习，一面在车间劳动，毕业时在一个工种上达到一、二级工水平。这类学校的毕业生，比中专学生的知识面窄但专，并有一定操作技术；比技工学校学生的操作技术较低，但理论知识比技工学校的学生高，他们毕业后，更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正如工程技术人员说：“半工半读毕业生当工人安心负责，当干部和技术员也能胜任”。

总结以上经验，我们认为半工半读教育应当作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地、有条件地恢复发展，使它在全日制中专、技工学校一起，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一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或生产技术比较复杂的新扩建企业，可招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办半工半读中技校，自力更生培养适合本行业需要的技术人员。工厂企业举办半工半读中技校，兼有全日制中专和技校二者之长，但比普通中专改办的职业学校在生产设置、劳动场地、专业师资的来源和毕业生分配等方面，条件都优越。

目前各厂都有一批粉碎“四人帮”后入厂的初中毕业生，有待提高。可以采取“六二制”半工半读的形式，使他们尽快达到高中或中专毕业的水平。一些生产任务不忙的工业企业，经过调整劳动组织，可以组织全厂或部分职工实行“六二制”半工半读。把占用生产时间的学习成绩，作为全面考核的一项内容。这样，就可以迅速提高职工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更好地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制和组织纪律，同任何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独裁制等等没有共同之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那种认为坚持集中制就可以忽视民主或者不要民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无产阶级政党把自己的集中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是自自觉自愿地执行和遵守由党组织集体制定的、反映广大党员的意志的决议和纪律，而绝不是被迫执行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命令和意志。

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是高于一切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无疑地应当服从于党的事业的需要，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

从领导十月革命到以后的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布）为了完成新的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实行高度的集中制、战斗命令制和铁的纪律。为了加强集中领导，党赋予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以很大的权力。俄共（布）在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规定，由中央委员会讨论解决“一切非急需解决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组织问题”，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根据这些规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领导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及时地处理了许多紧急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军事方面的问题。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往往来不及同各各级党组织进行商量，这样就使党内的民主生活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党采取的这些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对于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都是必要的，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即使是在这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制，也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的。布尔什维克在实行高度集中制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发扬党内民主，尽可能地健全党的民主生活。

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表现之一是，党内讨论与争论问题的自由，进行批评的自由继续得到保证。党员在参加对党的重要问题的讨论中，能够畅所欲言，坚持原则，而不致遭受压制和打击。党员具有这项民主权利，对于党能够制订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学习列宁，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

刘立凯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1917年2月沙皇政府推翻，资产阶级成立了临时政府。这时候，布尔什维克究竟应当作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对派，进行议会斗争呢，还是应当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对于布尔什维克广大党员来说，是一个不太清楚的问题。因此，当列宁的著名的论战争与革命的“四月提纲”提出时，党的中上层干部中间很少有人赞同。直到十月革命前不久，党中央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影响下，对列宁关于及时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仍然置之不理。处于这样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正是由于党内有言论自由和正常的民主生活，列宁的主张迅速地到达了广大党员的面前并得到他们的拥护。在列宁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举行十月武装起义的历史性决议。在国内战争时期，党内的政治生活仍然活跃，讨论问题的空气很浓厚，没有任何人由于对党的政策或对党的领导人的意见而受到打击报复和处分。

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另一个表现是党始终严格执行集体领导。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央委员会仍然实行真正的委员会制，中央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其中任何人都没有拥有任何特权。在通过提案时，要进行投票表决，严格地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党中央对讨论的重要问题进行表决时，有时只差一票或几票，就影响到提案的通过或否决，这就防止了在决定重要问题时出现任何个人决定的因素。在列宁主持下的政治局，即使在战争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有的政治局委员不在首都，列宁总是在首都的政治局委员商量，实际上构成政治局中的多数，才作出决定，从而不从中任何个人作出决定，从不发布个人指示。政治局集体作出决定后，由个人分工负责执行。政治局的工作在一定时期内须向党中央全会提出报告。列宁主持下的俄共（布）中央和政治局的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坚持实行党内民主的另一个表现是，党始终把代表大会作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决策机关。1918年初，在关于苏维埃俄国是不是应当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上，党中央发生了激烈的

争论，这就要交付全党来进行裁决。三月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为此而召开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列宁关于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否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继续进行战争的提纲，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这次大会起到了统一全党的思想、维护全党团结的重大作用。此后，在列宁主持下的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起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路线的最高决策的作用。

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是应当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作适当的改变的。高度集中制和战斗命令制在革命与战争时期是应当采取的。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为了加快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动员全体党员，包括最落后的党员参加，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而这些要求必然要同高度集中制、战斗命令制等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发生矛盾。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列宁亲自主持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特别强调大力发扬党的民主，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和党的各项民主制度，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便集中他们的全部经验、智慧和力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大力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代表大会的决议着重指出：在战争时期实行的战斗命令制——这种战斗命令制，由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普通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应当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平到来的时期，党必须加强和健全民主制。党组织应当允许广大党员，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开展广泛的讨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的决议。各级党组织的全体党员大会和代表大会，都要定期或经常召开。会议必须提出并讨论一切有关党的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党和国家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并且要求作到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决议中强调：不容许采取任何高压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鉴于党内官僚主义、升官发财思想的继续滋长，党员滥用职权以营私舞弊现象的陆续出现，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国家监察部没有威信，因此，列宁特别强调建立一个健全的、有权威的党的监察机关，以便同这些腐化堕落的机体的行为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在列宁的积极倡议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建立和加强党的监察制度的决议。这些决议中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都由同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同级代表大会负责。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同级党委如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或同级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解决。列宁强调党的监察机关要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独立性，它们不应在同级党委委员会的领导下，不能成为同级党委委员会的助手或“附属品”，它们在行使自己的职权的过程中，必须得到法律上的切实保障。在列宁亲自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都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任期未届满前不得担任其他工作。”这项规定，保证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进行监察工作中，不致由于坚持党的原则触犯了某些领导人的利益而被调离职务，使监察任务不能完成。

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列宁提出的关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大力发扬党的民主，健全党的各项民主制度的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建设上的光辉思想，为在和平年代的无产阶级党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但是可惜，列宁的这些主张，在他逝世以后，俄共（布）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特别是到了三十年代，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的削弱和破坏。这些削弱和破坏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

鉴于俄共（布）在党的建设方面所提供的经验，也包括我们党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进行破坏的教训，我们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力恢复和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大力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大力促进党的民主化和国家民主化的过程。这些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列宁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建党的学说继续推向前进。

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

王诚尧

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结余”，是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我们的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求当年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同创造的国民收入总量平衡。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总量是否平衡，取决于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否平衡。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就会是平衡的。由于信贷平衡要通过贷款政策（企业流动资金和长期性投资贷款等）来保证，外汇收支差额靠财政拨款来弥补，财政、信贷等的资金分配又制约着物资的分配，因而财政平衡在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个平衡及其相互间的综合平衡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搞好了财政平衡，才可以搞好其他三个平衡及其相互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地按比例地高速增长发展。

依据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国家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在这里，财政收支平衡是一个重要杠杆。因为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以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而财政资金的多少，它的增长速度和分配的结构，则制约着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和速度，制约着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及其相互间的协调平衡。只要按一定比例制衡的财政收支平衡了，财政收入不超过国民收入的一定比例，基本建设投资不超过财政支出的一定比例，各项资金又分配合理，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积累、消费比例关系也就控制住了，积累就不会搞过头，国家建设规模就不会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负担限度。

为了及时弥补可能出现的缺口，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克服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物资后备是不可缺少的。而物资后备的资金来源则是财政后备。这除了国家财政分配用于建立国家储备的资金和预备费以外，每年的财政结余资金，也是财政后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结余资金不能过多，只能是略有结余。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产生财政赤字的经济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当，也会发生财政收支的不平衡。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情况，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解决。

第一，正确处理财政计划和计划经济的关系。编制财政计划要同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结合，做到相互适应、相互制约。一方面计划要贯彻财政，应该首先考虑经济计划，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订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来保证经济计划的完成。另一方面计划也要制约财政，要用财政计划从分配到再分配的角度来测算经济计划是否可靠，用财政计划的执行情况来检验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绝对不能只是财政无条件地跟着计划的盘子和路子走，以至影响财政平衡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编制财政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财政收入要打打可靠，有可能超额完成，决不要超过；财政支出要适应物资结构和数量的情况，按照一定次序，分别轻重缓急安排，决不留缺口。在预算执行中，追加追减收支，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追加支出时，要有相应的资金来源；追减收入时，必须相应地减少支出，注意经常保持收支的平衡。我们的财政平衡是综合财政平衡，除国家预算收支平衡这个主体以外，还包括信贷收支、企业专用资金、预算外资金、专项贷款资金和借用外资在内的综合财政收支的全面平衡。它们之间的平衡是相互影响的。例如，借用外资进口设备，国内要拿钱配套，借的外债还本付息，最终仍要财政上拿钱，同财政收支了不。因此，必须编制综合财政收支计划，做到全面的综合平衡，以免顾此失彼，发生失调。

第二，正确解决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 and 方向问题。历来影响财政收支平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投资结构不合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每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一般占积累总额的一半，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也必然相应过高。根据我国的国情、国力以及历史经验，今后一个相当时期，积累率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较为合适。以此来检验我们现在的情况，积累数额仍然嫌多，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嫌大，超过了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为此，必须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要摸清情况，清理在建项目，果断地按照中观规定停建、缓建一批建设项目，特别是对那些计划外的基本建设要坚决压缩，把设备和原材料腾出来。同时，要严格控制新项目上马，严格核算每一基本建设项目的



四化的艰巨任务与干部的现有状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就向全党同志提出了一个重新学习、逐步懂行的问题。《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还规定，长期党于当外行，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最近听说某机关一位领导同志竟说：“这不是要同我们过不去吗？不是硬逼着我们第二次进班吗？”言谈之中，不仅对中央的决策不理解，似乎还很有点情绪。在领导要不当内行的问题上，公开这样表明不同意的并不多，但思想上或多或少有疙瘩的恐怕不是绝无仅有。

依我看，要求党干部努力变为外行内行，这不是要他们靠边站，而是要他们靠前站，即依靠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各部门的知识，站到实现四化这一伟大斗争的前列，对所担负的工作进行正确而又有效的领导。

谁都知道，进行现代化建设，就是要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用科学的方法来改善、改革经济管理使之达到新的水平，从而发展社会化的、现代化的大生产，为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打下雄厚的基础。显然，没有专业知识，没有管理能力，没有组织才干，是适应不了也领导不了四化建设的。经济、科技、文教战线上的干部如此，从事党政领导工作的干部同样如此。党政干部跟专业技术人员掌握科学技术的要求上尽管有所不同，但是如不懂得一些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基本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就不可能发现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也不可能积极选拔有培养前途的人才，大胆支持有真知灼见的倡议，结合业务去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工作，还往往会由于缺乏共通的心理和共同的语言而压抑工人、业务技术人员积极主动精神。

投资效果。投资结构也要调整，改变过去那种偏重工业、轻农业和轻工业的状况，保证能源、交通运输、建筑等薄弱环节；通过革新、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

第三，在扩大企业财权的同时，要加强国家财政的计划指导、管理和监督。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企业手上的钱多了，预算外的资金增加了，也有可能从本位出发，出现盲目性，影响财政收支平衡。这就特别需要加强国家财政上的管理监督。要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际经验，在财政上规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引导企业把手上的钱用好，提高资金使用率的经济效果。

第四，要大力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只有生产发展了，成本降低了，企业盈利增加了，才能丰裕财政，从根本上保证财政收支平衡。要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创造纯收入，保证税收、利润按照规定及时上交国家。

“靠边”还是“靠前”

雷 诚

现在，全国人民都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四化建设上。为了在干部结构上进行相应的改造，从组织领导上保证四化的顺利进行，我们对于挑选拔擢干部，应当有新的要求和标准，尤其是要调整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成员应当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组织领导能力的，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如果不是这样来选用干部，仍然坚持战争时期的标准，或者坚持土改时期的标准，甚而按照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会因为缺少真正能带领群众去贯彻实现新时期的总路线的骨干力量，而使四化建设有落空的风险。

有些领导干部安于现状，甘当外行，不理解重新学习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里有一个根本认识问题有待统一，就是：当领导究竟靠什么？是靠资格，靠权力，靠多少年习惯了的工作方法呢，还是靠真才实学，靠过硬本领，靠能够驾驭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能力？我们说，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资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革命经历和丰富经验，权力是党和人民给他的一种责任和履行责任的一种手段，长期沿用的某些基本的工作方法在条件下也还是有用的，对这些我们都要作具体分析的态度，没有理由加以贬低和否定。但是，仅仅依靠这些东西来领导艰巨复杂的四化建设，来处理四化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是靠不住的。归根结底，要实现对四化实现正确的有效的领导，必须靠一大批坚强有力的干部；而这批干部，只能靠能力而不能靠权力，或者说得确切些，靠能力和权力的结合。因为一个干部当了领导，被赋予了权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就生长出知识和才能，就有高明的主导水平，关键在于他是不是顽强地不断地学习。以往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

很多同志勤奋学习，刻苦钻研，逐步成了熟悉精通本职业务的内行，一身而兼领导和行家，他行使权力时就会用到点子上，起到好作用，促进四化的进展；另一种是，有些同志不懂行又要拿架子，既缺乏自知之明，又无求知之心，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好尚空谈、不学无术的空头“政治家”。他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是利用权力去“加强领导”，对四化建设越是带来不利的影响。这种情况说明，如果我们领导干部，自诩懂得战争规律、富有土改经验和熟谙一整二查搞政治运动的办法，不自觉地努力和努力适应新形势对自己提出的新要求，那确实是有丧失领导资格而被“靠边”的可能。不过，这不是领导同你过不去要你靠边，也不是群众胡扯乱斗把你靠边，而是干部队伍择优汰劣、新陈代谢的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权力是不能用以长久保护懈怠的，“外行能领导内行”也应拿当作为不愿学习的挡箭牌。经过批评教育，长期仍然不懂行、不称职的干部，只能离开领导岗位，由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所取代，这是党的利益和四化建设的需要，对于促使干部本人的奋发进取也是有利的。导致这种“靠边”的情况谁难呢？只好怨那些相形见绌而又不上求进的干部自己，因为他们自行“靠边”的嘛！

当然，这种“靠边”的情况应尽量减少。目前我们的相当一批干部不懂行，这是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客观原因的，不能完全归咎于干部自己。要帮助干部尽快改变现状，各级党组织除了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使之增强学习的决心和信心之外，还要积极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有了条件，不是学进去，钻下去，有所得，那就要看自己的主观努力如何了。

可以相信，我们的干部只要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四化中的崇高责任，就一定会自觉地勇猛地跨进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经济的门槛，不是“靠边站”，而是“靠前站”，努力做一个称职的四化建设的指挥员！

指供、诱供也是犯罪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刑讯逼供是犯罪行为，编制造假的要判刑。《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例定：“严禁刑讯逼供。国家工作人员对下级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拘役。以肉刑虐待人身的，以伤害罪从重论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由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得这样明确，今后，在审判工作中，用直接拷打等刑讯的办法来逼供，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不会再出现了。但是，用变相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办法，用威胁和欺骗手段来进行指供、诱供的办法，还是可能出现的，需要我们十分注意。

我们在审判案件时，如果带往了框框，先入为主，在审讯中就往往会出现指供、诱供的情况。要被告供认符合自己框框的要害，在收集证据时，也会收集一面之词，造成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另外，也可能采取威胁问供、威胁诱供的办法。这样做，不仅不能准确地定罪量刑，还会发生冤、假、错案。所以，我们看有没有刑讯逼供，不能

单纯从形式上看在审讯时是否用了拷打等办法，还要看是否有变相的逼供，是否使用了指供、诱供的办法。如果指供、诱供，那种就是逼供信的违法行为，必须严惩。

指供和诱供，不仅对被不能使用的，就是对证人也不得使用。如果在证言上出现虚假情况，就会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难以弄清事实真相，甚至把案件搞错，冤枉好人，放纵坏人。所以，不论用野蛮的肉刑，还是用貌似文明的指供、诱供，都是犯罪行为，在审判工作中都是不能允许的。

(沈关生)



